



生活志

女儿的来电

□王半路

在我们三个人的群里，女儿发出最后一条消息：要上交手机了，记得想我！妻回复暖暖的小表情，而我安慰道：没事，有校园卡呢。被女儿命名为“老年活动中心”的微信群，又开始一周的静默。

入校第一天，我站在教室窗外，看见过她上交手机的情形。她磨磨蹭蹭起身，排到同学的最后面。老师登记后，手机塞进一个白色的塑料袋，集中放进一个小箱子保管。老师温和的脸上，带着笑意。此后，我便再没有送她到过教室。按照规定，家长即使到了校门口，也进不了教室。但是，可以想到，每次新的一周上交手机，坐在第一排的女儿，都会故意拖延时间，依依不舍地关机，再递给老师。否则，在那片刻功夫，“老年活动中心”群，不会像发起冲锋似的，一长串女儿告别的话。

一年前，并不是那样的。手机，虽然也要交给老师代管，然而，女儿人机分离，和我们分开，最长不超过一个白天。晚自习结束，她骑自行车回家。没有骑车的时候，她迅速打电话给我：爸爸，我出校门了，你站在哪儿呢？确定方位后，我就从夜色中迎向女儿，一起回家。

女儿上高中，别无选择，只得住校。这个省级重点学校，隶属本市辖区，离家仅仅二十来里路，是中考分流女儿的最优选择，也是我久远的故乡。她的姑婆，就住在学校对面。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为侄孙女担当第一看护人，费了不少心思。学校的环境不错，文化气息浓郁，仿大学城建筑布局，教学楼和学生宿舍，掩映在葳蕤的花草树木之中。遗憾的是，这一切都不能缓解女儿初次离家的难过，加上学习的压力，以至于相继出现头痛、厌食、失眠等症状。我们希冀女儿向上飞跃的平台，竟成为她几度想逃离的牢笼！

军训期间和入学不久，她借助舍友的电话手表，班主任老师的手机、门卫室电话，每天给我们打一通电话。军训期间，有两次宿管阿姨听见她的哭声，推开门，大方地让她使用了自己的电话。等我回拨过去，却次次忙音。电话那端揪心的哭泣，瞬间瓦解我。但我总是鼓励她。女儿的情绪，女儿的脆弱，飞沙走石般，扑到我们的面前。每次她回到家，都要主动拥抱妻，拥抱爷爷奶奶。和我说许多话，像我曾经期待的那样。我明白，女儿成长的关键期，真正到来了。

旌城四友一本书

□蒋晓东

四个男人结成了哥们，是那种很铁的哥们，被圈内伙伴誉为“旌城四友”。这四位老师，是居住、工作和生活在德阳的周建华（天台）、侯为标（彪哥）、王守槐（如风）和郝志武（思域无疆）。他们合伙捣鼓了一本书，自然而然地，无可非议地，将“旌城四友”前后的引号换成书名号，便成了他们心仪的书名。旌城，德阳的别称。于是，我闻到了旌城的香樟树增添了更多的清香，我看见了旌城的月季花的颜色不由自主地更加斑斓。

我是绵阳人，捧着旌城四友的《旌城四友》，一些不算往事的往事，瞬间在心河里流淌开来，而在溅起的浪花中，我看见了绵阳河、凯江、石亭江、鸭子河，当然还看见了从云盖山婉转而下的罗纹江。

周建华如大姑娘一样的端庄姿态，以及谈话的“稳定性”，阳刚中透着的不仅是似水的柔情，更有眼界的辽阔，是一位稳稳坐在船上、并且叫撑篙竿者往什么地方撑的人物。好像也不尽然，从另一面看，周建华还隐隐给我一种莫名的“城府”，大有“真人不露相”的神秘。这种“城府”和“神秘”给人一种压迫感和好奇心。

侯为标的我行我素、大开大合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聊天风格，我理解是他的个性使然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，配得上“凶巴巴”三字。他的眼睛很“杀人”。但是有一次，我坐过他的“宝马”，他把我从乡村送到德阳火车站，他开车时候的洒脱与不急不缓，“沉稳”二字又在我心里驻足。我与他萝卜酸菜之类的阵阵乱聊以后，他的“凶巴巴”以厚道的姿态刻在了我的心中。

胖墩墩的王守槐，有点风风火火，有点我行我素，像个自由自在的青春少年，似乎离成熟还差一根线。但有一次，我俩坐在年画村一户人家的门槛上交流，讲文学，讲人生，谈天说地，他的话又是那么和蔼和在情在理，靶靶命中十环，与他的“五大三粗”极不相称，他深藏不露的丰富内涵，让我无言以对。我后来使劲想，他胖嘟嘟的脸上，应该有一个酒窝才好。

郝志武注重细节的妥帖，答应了的事情，一脚一手必须到家，我眼前这本《旌城四友》，是他专门到绵阳送到我手上的。有时候，郝志武又不分场合地十分“搞笑”，就像是一个引狮子起舞的“笑和

校园卡的出现，对于有的孩子来说，难得一用。但是，这张我从未目睹真容的卡片，却被女儿用到了极致。中午十二点，下午六点和晚上十点，她打电话给我们。三通电话，轮番打给我俩，或者，一整天都打给妻，又或者，三次都打给我。有时，也会打给爷爷奶奶。来电号码总是固定的那三个。这才知道开通了校园卡。

于是，每天等待女儿的电话，成为我们日常的重心。时间点一到，就拿起手机，准备接听。三人心意相通，预备接电话的动作，几乎没有落空过。校园卡单向拨打，而且每次通话的时长，限制在三分钟以内。因此，我们的对话，常常还没结束，电话就自动挂断。这时候，她总是重新排队，再打一次。反正要说的话，必须说完才会离开。其他不固定的时间，她也抽空打电话。如果一整天都没有一个电话，晚上十点钟下晚自习后，女儿的来电必定不会缺席。

女儿的电话内容，大多还是诉说烦恼。食堂菜难吃，要考试了，某位老师讲课听不懂等等。其实，所有小烦恼的输送放大，都是因为，不能每天回家的大烦恼在作祟。从周日下午坐拼车回校，到周六下午坐城际公交车回家，她的情绪变化，好像周而复始地低高音转换。抽泣至啜泣，至哭腔，周五晚上那通电话最平和：爸爸，明天我就回来了，想吃虾。安排，必须安排呀！自从住校后，回家吃饭，她再也没有挑剔过我的厨艺，家里的任何菜都说好吃极了。有时候，情绪起伏也会不遵守规律。刚刚星期一，本是最煎熬的时间点，她却故作轻松地说：爸爸，你的女儿，今天居然没有哭，厉害吧？当然厉害，爸爸不但理解你的脆弱，而且对你的坚强勇敢，信心百倍！

今夜，秋风浓重，秋雨豆落，我裹紧被子看电视。心想，女儿恐怕回宿舍了，不会有电话了吧？电话却仍旧响起，我焦急地问：淋雨没有，冷不冷？女儿安慰我：教学楼下淋不着雨，而且我带了伞。她告诉我第一次月考的成绩，位居年级前列。电话接连打足了三次，分析这次各科失分的原因。我担心她后面还有同学排队，让她挂断电话。她说：后面没人排队，都回宿舍了呀！

我催促她赶快回去休息。幽暗的雨幕中，女儿瘦小的个儿，有个长长的身影。

尚”，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笑声。有一次在德阳高槐，当着几十个男女伙伴，他拉着我，硬是在“在建路”上玩起了“二人转”。郝志武的“强人所难”让我开心，我从此干脆叫他“好老师”了。这绝对不是以“郝”改“好”，这个“好”是从我心底里发出的。

这四个男人起码有三个共同爱好：写作、喝酒、“打广子”。他们特有的“三句半”称号，就是“打广子”打出来的。据伙伴们说，四年前的春天，在德阳晚报玩主部落群组织的“初见”聚会上，他们四个男人赶鸭子上架，披彩打锣，表演曲艺“三句半”，硬是把参聚的60多人乐翻了天，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，喜欢文学创作的几个男人家，居然才艺滚滚，无所不能，穿山打洞，梦回唐朝，真怀疑他们有十九般武艺。也正是由“三句半”开始，他们的友情蒸蒸日上，势不可挡，常常邀约一起，向着东南西北中，风风火火，“仗剑走天涯”。后来他们要联合出书，理所当然把书名确定为《旌城四友》。

《旌城四友》是一本散文诗歌集，就我个人对文学的认知，文学必定是人学，从人的内心的思维活动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出发，这才是文学最纯正的面貌。在《旌城四友》中，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体裁，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风格，或者叙事和抒情同盟，哪怕经过九曲十八弯，终点必定是心中那个彼岸花开的地方。每篇诗文，如果用包饺子来形容，他们的漂亮可口的饺子皮里面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饺子馅，而馅里面不仅有肉，还有五花八门的上口的调料。他们喜欢喝点小酒。有菜，菜下酒；无菜，话下酒。他们从来不缺菜，因为他们无话不谈。于酒，让我想到了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用在他们身上，应该是“醉翁之意不在书”，而在于情。不得不佩服他们玩出了文学的新鲜活儿，四个人出版一本书，看起来有点玩笑了过头了，但这恰恰是他们对文学所要表达的人学的另一种解读，每一篇直抵心灵情感的诗文汇在一起，张扬或暗涌着他们的共同心声。这是文学赋予他们、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另一种功能或者意义。

《旌城四友》是一本好书，是一本溢透着奇特芬芳的好书，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周建华、侯为标、王守槐、郝志武四友，是我羡慕的合格的朋友。



一个小面馆，老板是个女人，四十岁上下，身材结实举止干练，在偏仄的小面馆里几排紧挨着的条桌间灵活地穿进穿出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让人想起一个词：如鱼得水。

女人戴副眼镜。之前我一直觉得她戴眼镜有点滑稽——一个开面馆的，戴副眼镜，又不是时尚的那种，是要装文化人吗？这年头，文化人又不是一个多么高尚圣洁的词。后来她站在面馆门前的台阶上，侧着脸，我发现她的镜片竟然圈圈套圈圈，才明白她戴眼镜就是因为近视，仅此而已。

但是，一个开面馆的，算体力劳动，咋就近视得那么厉害？有故事？我不知道，也没机会打听她有没有故事。

女人的声音响亮，时不时响起，说得最多的两个字是：慢走！

她是给那些吃了面，扫了付款码的客人说的。

慢走两个字，有时候声音短促有力，有时候声调悠长余音不绝，这主要取决于客人走了多远的距离。比如客人刚刚扫了码，正起身直腰准备离开，她那一声“慢走”就很短促、坚决，大有扫你出门之意；如果客人已经出了门，到了巷子中间，正在躲避左右的车辆，甚至已经到了马路对面的梧桐树下，她那声“慢走”就处在了高八度的位置，且拉得很长，那声音让客人再怎么分心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并忍不住回头应一声：“哎！”

开始的时候我也会下意识地应一

声，无论她的声音短促还是悠长。但很快发现我的回应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意义，我回应一声“哎”的时候，发现她已经钻到了厨房里，正高声吩咐她老公：二两米粉，清红汤，多放葱……

才发现她那声“慢走”是习惯性的，或者就是例行公事。

而且她把在店里帮忙的不知道是她妈还是她婆婆的老太太也影响了。客人扫了付款码，老太太也会说一声：慢走！

老太太的声音要弱很多，轻很多，给人感觉她说“慢走”两个字时多少有点占了人便宜后的不好意思。

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老太太也会跟她一样，这是一种直觉，没有理由。

不过，光凭耳朵听付款码的声音也有失误的时候，有一回我就见到一个客人进店就扫了码，女人背对着客人正收碗筷，听见扫码付款的声音，照例来一句：慢走！那个客人半开玩笑地问：我是来捐款的？面都没上来你就让我慢走？

虽然知道她那声“慢走”就是一种习惯，没太多含义，但有人对你客气，且绝对没有给你挖坑设陷阱的意思，多少还是会生出几丝小感动。吃面，给钱，这本是一种契约关系，谁也不欠谁的，但履行完这种契约，人家还免费对你客气一声，这已经相当于买裤子送口罩的福利了。

但这样说也并不算准确。对人客气这件事情要较真，确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，但人除了活在规则里，显然还活在某种情绪里，离开这种客气带来的情

老杨图说

「慢走」
□文图 杨轻抒

绪感氛围感，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很荒凉？

客气也有升级版。有一次在玉泉市场买几根红薯，卖红薯的是一个小小个子大姐，上秤一称，差一点五块钱。大姐说添够五块嘛，我给你捡一根光生的（红薯）！

不由分说，就从一堆红薯里捡了一只出来。

肯定挑一根光生的，大姐强调说。

那根红薯跟其他的红薯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她说“光生”，我也看不出来哪里“光生”了，但是大姐又加一句：一看你就是一个厚道、实在的人，我肯定要专门挑光生的！

她说的厚道、实在，并没有傻、好骗的含义，纯粹就是一种小恭维，大致是指人品比较端正品格说不定还算高尚的意思，这个我听得出。所以我也没有想要去跟她较真到底那根红薯“光生”还是有疤痕，更没有想揭穿她就是想多卖一根红薯给我的小心思，反而觉得她的恭维挺有趣，于是也顺口回她一句：哎呀，一看大姐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美女，现在上年纪了都还有当年的影子嘛！

气氛一下就欢乐了。大姐显然很开心，转头笑着去骂她的女儿：就你懒，叫你多给这个大哥扯条塑料袋，你耳朵聋啊？！

提着红薯，我转身，大姐还说：慢走啊！

这回我听到的这句“慢走”，其中的感情色彩跟小面馆女老板的那一声有明显的不一样。

人世间

“肉娃娃”的幸福时光

□易延端

“来，来，来，端娃子快夹肉，这块最大——”八仙桌上，三舅和三舅妈看到一个劲儿忙着大块大块地吃肉的我，便笑着用筷子轮番给我夹肉。个子矮小的三舅妈，则把一份腊肉特意移到我面前，她微笑的两只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。

三舅的家在彭州市白鹿河畔的思文乡梓柏村，青山绿水环抱，四季鸟语花香，处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。思文乡的街道名叫思文场，系因纪念西汉时期蜀国郡守文翁治水功绩而得名。

作为母亲的娘家，思文场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，其中就包括三舅一家称我“肉娃娃”的那些幸福时光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，正是“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”热火朝天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，天擦黑了才急忙赶回家，成天忙着在生产队做工，唯一的目标就是给一家人挣来糊口度日的粮食。

春节生产队休工期间，父亲大都要忙着扛石头砌家门前的堡坎，有时还要做善事修桥补路，母亲则要在家烧锅煮饭，外出走亲访友的事，自然就落在了我和大哥的头上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从我五岁开始，每年正月初二那天，大哥就要早早地催我起床，背上装满挂面、腊肉的竹制扁背

篋，带着我步行到思文场上首的梓柏村，给大哥、三舅家拜年。虽然相距只有十六里路，但是对于年仅十岁的大哥和五岁的我而言，这无疑是很艰巨的任务，但也是光荣的任务。

我们来往思文场的道路，除了公路是碎石路，小路都是泥巴路，晴天一身灰，雨天双脚印，行走起来非常不便。途中，还要经过横亘在长江二级支流湍江上的狮子山铁索桥，桥面非常窄，仅容纳两个人并行，江面离桥高十米，三根直径约两公分粗的铁索上，铺着稀稀落落的木板，人走在上面就左右摇晃。

好在春节时恰逢枯水期，江水没有汛期湍急，但为了减少人为的摇晃，我们哥俩还是要等到没有其他人通过的时候，才迈着小步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。

记得我六岁那年，不小心摔倒在铁索桥上了，几次欲奋力站起都没有成功，走在后面的大哥很是着急，但又不敢弯腰拉我，他生怕背篋里的挂面、腊肉掉到桥下江水中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得摸着一个又一个木板，一边哭一边慢慢地往前行。

当我们哥俩赶到三舅家时，已是中午时分，他们一家做好饭菜，正翘首等着我们。

“延发，你们兄弟俩快过来坐下吃饭了。”大哥放下背篋，我们刚洗完手

脸，香喷喷的饭菜早已摆满了一桌子。看着大盘大盆、红亮亮的腊肉、排骨、香肠、猪心、猪肝、猪耳朵，我根本不想吃，抓起筷子就发起了进攻。

“慢点、慢点，三舅家有的是肉，你端娃子尽情地吃……”三舅一边看着狼吞虎咽的我，一边嘿嘿嘿地笑着说。正忙着往我碗头夹腊肉的三舅妈笑着插话道：“看来，我们家来了易家肉娃娃啊！”

我后来才知道，其实，那时的三舅家不仅不算富裕，甚至可以算贫困。三舅妈人矮小，一身疾病，需常吃药治疗，左邻右舍的人背后说她是“药罐罐”。他们当时养育有两儿一女，主要生活来源就靠三舅，他宁肯自己吃苦受屈，也要宽厚待人，且以此要求家人。

如今，三舅和三舅妈都已九十高龄，三舅的身体比较硬朗，三舅妈的病也好许多，他们平时除帮助儿子儿媳料理一些家务外，偶尔也力所能及地做点农活，过着平淡却开心的日子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仍常忆起在三舅家走亲戚的那些时光，也偶尔带着妻子前去拜望他们二老。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童年时期，他们让我尽情地大块吃肉的缘故！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每当想起他们称我“肉娃娃”的时候，我就由衷地感到幸福。